

后工业化初级阶段与新时代中国经济转型^{*}

郝寿义 曹清峰

摘要:经济发展阶段转换是导致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深层原因。本文基于区域经济发展循环规律,在对后工业化阶段核心特征与典型发展模式分析的基础上,认为由工业化阶段向后工业化阶段的转换期是一个独立的后工业化初级发展阶段,基于中国宏观与区域经济的判断表明中国已进入后工业化初级阶段。新时代中国经济转型必须立足于后工业化初级阶段发展模式,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同时,对发展模式施加约束,保持合理投资增速与制造业规模,加强供给侧改革与创新驱动发展。

关键词:后工业化 发展阶段 新时代 经济转型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快速的增长,名义GDP由1978年的0.37万亿元上升为2018年的90万亿元,在四十年间GDP总量增长了两百多倍,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近年来,尽管中国经济增长仍然维持了较高的增速,但与前期相比,特别是进入“新常态”以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明显的放缓趋势。那么,导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如果按照传统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观点,在短期内总需求的冲击会导致经济增长出现周期性变化,这意味着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只是一种短期现象。如果上述观点成立,通过基于需求管理的宏观经济政策干预可以让经济增速重新回到之前高速增长路径上。与上述观点不同,本文认为,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分析要植根于中国经济的特殊性,特别是中国在长期内属于转型经济体这一重要事实。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与城镇化过程,同时叠加了第三次、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机遇,中国经济的制度结构、产业结构、空间结构等处于不断的转型过程中。对于转型经济体而言,经济系统很难存在一个长期的稳定均衡,这使得中国宏观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不再是连续的,而是具有阶段性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从经济层面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转换存在密切联系。只有在厘清中国经济发展所处具体阶段的前提下,才能将新时代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任务落到实处。因此,有必要从发展经济学以及区域经济学角度对当前中国所处发展阶段进行再判断。

在关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研究中,李斯特1841年在其《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将经济发展分为狩猎状态、游牧状态、农耕状态、农工状态和农工商状态五个阶段,这是一种相对粗糙的划分。Rostow(1960)在其经典的“经济成长阶段论”中,将经济发展划分为传统社会阶段、准备起飞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大众消费阶段和超越大众消费阶段。Chenery(1986)根据其“多国模型”,

^{*} 郝寿义,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邮政编码:300071,电子邮箱:shouyihao88@sina.com;曹清峰,天津财经大学现代经济管理研究院,邮政编码:300222,电子邮箱:caoqingfeng1988@126.com。感谢审稿人的意见,文责自负。

以人均 GDP 作为标准,将工业化阶段分为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工业化初期阶段、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化后期阶段、发达经济初期阶段与发达经济后期阶段共六个阶段。按照类似的标准,世界银行从 1987 年起按照人均国民收入的大小,将所有国家分为低收入经济体、中低收入经济体、中高收入经济体和高收入经济体四类,这也反映了不同经济体发展阶段的差异。

由于经济发展阶段转换与产业结构变化密切相关,因此也可从产业结构演化的角度对经济发展阶段进行划分。根据配第一克拉克定理,由于产业间相对收入的差异,按照劳动力在不同产业就业比重的变化,可将经济发展划分为准工业化阶段、工业化初级阶段、工业化中级阶段、工业化高级阶段以及发达经济阶段。Kuznets(1955)进一步通过对 20 世纪 60 年代之前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演变规律的考察,结合产业就业比重与收入变化,将经济发展阶段划分为工业化初期阶段、工业化中期阶段与工业化后期阶段。此外,根据“霍夫曼定理”,工业化过程中资本资料工业(重工业)的规模相对于生产资料工业(轻工业)的规模是不断提高的,以霍夫曼比例系数的 5、2.5 与 1 为临界点,可将工业化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上述研究主要从某一侧面(收入、产业结构等)对经济发展阶段进行了研究,如果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体历程来看,Galor & Weil(2000)的“统一增长理论”将人类发展史划分为马尔萨斯增长时期、后马尔萨斯增长时期与现代经济持续增长时期三个阶段,不同发展阶段在技术进步与人口增长速度上存在差异。“统一增长理论”的研究揭示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增长动力上的差异。Porter(2000)根据其竞争优势理论,也从经济发展动力角度,将经济发展阶段划分为生产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与财富驱动四个阶段。

可以发现,现有研究对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各异,这是由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性所决定的。但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对工业化以及工业化之前的发展阶段划分较为清晰、内涵探讨相对充分,那么,工业化阶段之后是什么阶段呢? Bell(1973)在其《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提出了“后工业化”社会的概念,其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前工业社会,经济主要由农业组成;工业社会,经济主要由制造业等部门组成;后工业化社会,此时信息、知识的作用日趋重要,服务业将成为主要部门。除了经济结构方面的变化,“后工业化”社会还涉及生活方式、社会组织模式转变等更多的内涵,因而是一个综合性概念,这为我们探索工业化之后的经济发展阶段提供了重要借鉴。

国内研究对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也进行了判断(郭克莎,2004;卫兴华、侯为民,2007)。特别是在中国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过程之后,目前研究对中国所处发展阶段的判断主要集中在已经进入了工业化中后期(夏杰长、倪红福,2016)或者后工业化阶段(文宗瑜,2010;胡鞍钢,2017)。在关于中国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研究中,胡鞍钢(2017)系统论证了中国已经进入后工业时代,认为后工业化时代是指一个工业化经济体或工业化国家所经历的一个工业化发展时期,具体表现为制造业所占经济总量比重持续下降,并明显低于服务业比重;服务业所占比重持续上升,并占主导地位;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并进入“信息时代”;最重要的是经济增长是创新驱动,更多地依靠信息、知识和创造力等。胡立君等(2013)以美国和日本为例,对后工业化阶段产业空心化的形成机理与治理机制进行了研究。徐朝阳(2010)从理论上阐释了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阶段工业部门的“倒 U”型变化趋势。纪明、梁东黎(2011)对后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文宗瑜(2010)探讨了中国后工业阶段的产业升级与企业转型路径。吴垠(2010)提出了设立后工业化经济试验区的设想。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对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仍然存在一定争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当前正处于发展阶段转换期,从而导致基于不同侧重点的研究结论具有差异性。同时,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争论也表明简单地将中国发展阶段判定为工业化或者后工业化阶段都是有很大局限性的,这种二元论忽视了经济发展阶段转换期的特殊性,特别是对中国这一发展中转型经济体而言,其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期可能会持续较长时间。

因此,本文认为,中国目前既不处于工业化阶段,也没有进入典型的后工业化阶段,而是处于后工业化初级阶段这一转型期。基于现有研究,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从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视角,对

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进行再判断,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在于:一是根据区域经济发展循环规律理论,提出了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三个核心特征,即要素禀赋转换、经济结构转换与增长动力转换,在此基础上归纳了后工业化阶段的核心特征与典型发展模式,这为我们识别经济发展阶段是否发生转换提供了一个简明扼要的判断标准;二是提出了后工业化初级阶段理论,并通过对中国宏观以及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事实判断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后工业化初级阶段;在此基础上,对如何在新时代立足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中国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发展模式、推动中国经济转型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二、后工业化阶段的核心特征与发展模式

本部分从理论上论证了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特征可从要素、结构与动力三个方面来概括。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后工业化阶段的三个核心特征,并对后工业化阶段的典型发展模式进行了总结。

(一)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标识性特征分析

识别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关键是明确不同发展阶段转换的标识性特征。本文从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角度,对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标识性特征进行总结。本部分中的“区域”,既可指一个国家,也可指一国内的次一级空间区位。根据郝寿义(2016)的研究,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是由初级循环与高级循环两个阶段组成的内生演化过程,具体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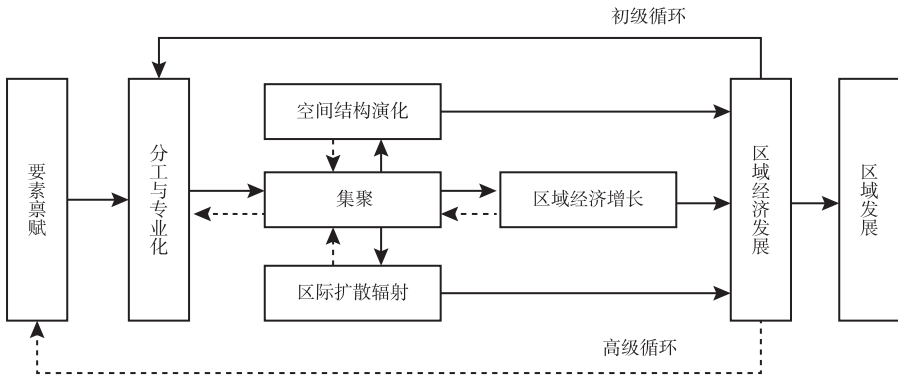


图1 区域经济发展的循环规律

资料来源:郝寿义(2016)。

首先,区域经济发展的初级循环指的是在给定要素禀赋的前提下,基于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分工与专业化,会形成相应的区域经济结构。其中,区域经济结构包含两方面的内涵:一是产业结构,这是基于由要素禀赋所决定的主导产业所形成的;二是空间结构,这是由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集聚经济所决定的,集聚经济的存在会导致产业在空间上的分布不均匀,并形成空间经济上的规模报酬递增的过程。进一步地,基于不同经济结构会形成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与此同时,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会进一步强化初级循环中的分工与专业化过程,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循环过程。

其次,区域经济发展的高级循环指的是在初级循环的基础上,区域经济发展会导致原有要素禀赋的变化。具体的作用机制为:一是在要素禀赋总量存在约束的情况下,不同经济结构下对要素的需求存在差异,由于不同要素的供给弹性不同,需求大且供给弹性小的要素价格上升会更快,导致引起生产中相对富裕要素替代相对稀缺要素,即区域要素禀赋的结构发生变化,而这会导致区域分工与专业化的改变。例如,在资源型城市的发展中,其基于某一资源形成的经济结构对原有资源依赖大,当原有资源消耗殆尽时,原有资源的开发成本很高,此时城市的要素禀赋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其经济结构必须进行转型。二是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内生技术进步的情形下,由于知识生产存在规模报酬递增与知识的累积存在不可逆性(就社会总体而言,已经获得的知识一般不会被遗忘),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技术总是不断进步的。一方面,技术进步会引入新的要素,导致要素禀

赋种类的变化,例如人类技术的进步使得之前不能利用的风能、太阳能等转化为新的生产要素;另一方面,技术进步也会导致生产要素投入比例的变化,实质上也改变了区域的要素禀赋结构。例如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要素的组合比例,并使之在生产中具备了新的功能。因此,通过上述两方面的机制,区域经济的发展会内生地引起区域要素禀赋变化,从而引发新一轮的初级循环。

区域经济发展循环规律与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关系在于,当某一区域处于区域经济发展初级循环时,其处于某一发展阶段的稳定发展时期;而当区域经济发展由初级循环向高级循环转换时,意味着区域经济发展阶段发生了转换。据此,我们将区域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标识性特征概括为三个:

(1)要素禀赋转换。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初级循环与高级循环是同时发生的,但是,当高级循环发挥主导作用时,区域的要素禀赋会发生质变。因此,我们可将区域要素禀赋结构转换视为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首要特征。具体可通过生产中的主导要素投入来判断,例如在农业社会中土地与劳动力是主导投入要素,而在工业社会中资本则是主导投入要素。

(2)经济结构转换。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循环规律,要素禀赋的变化会通过分工专业化进一步导致区域经济结构变化,因此,当经济发展阶段发生转换时,经济结构也会发生相应变化,本文将经济结构转换视为区域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第二特征。例如,农业社会中主要以空间上分散的小农经济为主,第一产业占据主导地位;而在工业社会中产业则在空间上形成了大规模的集聚,并以第二产业为主。

(3)增长动力转换。既定的要素禀赋与经济结构决定了经济的增长动力,因此本文将增长动力转换视为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的第三特征。不同经济增长动力反映了经济增长模式的差异,例如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向集约的转换,也反映了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

(二)后工业化阶段的核心特征分析

后工业化阶段是由工业化阶段转换而来,结合上文对经济发展阶段转换标识性特征的分析,可将后工业化阶段的核心特征概况如下:

1. 要素禀赋上,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土地、劳动力、资本与技术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在人类历史发展不同阶段,不同要素的稀缺性存在较大差异。工业化阶段的特点是人类在生产中逐渐摆脱了自然条件的约束,在工业化初期,主要是以劳动力密集型的轻工业为主,而在工业化中后期,则主要以资本密集型为主的重化工业为主,因此工业化阶段的主导要素是资本与劳动。但是,受劳动力要素价格的提高与资本边际收益率递减规律的影响,靠进一步提高资本与劳动力要素投入来促进经济增长是难以持续的。此时,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依靠索罗模型中外生的技术进步或者内生增长理论中知识生产的规模报酬递增,而技术进步是由高素质劳动力的创新来实现的,这意味着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提高,因此后工业化阶段创新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2. 经济结构上,第三产业占据主导地位。工业化阶段的主导产业部门是制造业部门,因此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的特征是第二产业占据主导地位。但在后工业化阶段,由于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技术与人力资本成为主导生产要素,密集使用主导生产要素的部门将获得更高的利润率,这会导致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制造业内部的生产服务部门逐渐独立出来,研发设计与其他技术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部门的规模不断扩大,而原有的制造业部门所占比重在下降的同时,向产业链与价值链的高端环节转型;二是由于后工业化阶段国民收入水平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居民对物质与精神生活消费产品及服务的需求不断扩大,这会使得生活性服务业部门也不断扩张。因此,后工业化阶段生产与生活性服务的扩张使得第三产业占据主导地位。

3. 增长动力上,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最高。经济增长动力可以从不同角度来定义,但从总需求来看,经济增长的动力由投资、消费与净出口三部分组成。在后工业化阶段,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最高,经济已经由生产型经济向消费型经济转型。这是因为工业化阶段密集使用资本要素,

因此其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来拉动的；而且由于区域自身的市场规模较小，需要通过扩大出口来消费过剩产品，对国外需求依赖度较高，使得净出口在经济发展中也有重要地位。但在后工业化阶段，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使得区域自身的市场变大，从而产生显著的“本地市场效应”，此时拥有较大市场消费需求的区域其经济增长要更快；同时，对国际市场需求的的增长也会降低贸易盈余，导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也下降；而高消费带来的低储蓄率会进一步拉低投资率，从而强化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主导贡献作用。

(三)后工业化阶段的典型发展模式

从经济史来看，目前进入后工业阶段的国家主要以高收入的发达国家为主，尽管其都具备上述后工业化阶段的三个核心特征，但由于不同国家初始要素禀赋、外部条件以及路径依赖与锁定效应的影响，这导致不同国家后工业化阶段在符合上述三个核心特征的同时，在具体发展模式上仍然存在一定差异。本文以目前已经成功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瑞典和芬兰六个国家为例，对后工业化阶段的发展模式进行总结。具体来看，后工业化阶段的发展模式主要包括以下三种类型：

1. 强服务业发展模式。强服务业发展模式主要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英国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早完成工业革命、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国家，其主要特征是经济高度服务化，服务业在 GDP 中的比重已经占据了绝对主导优势。例如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美国第三产业产值占 GDP 的比重为 54.5%，已经占据主导地位。图 2 报告了 1997—2016 年样本发达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可以发现美国与英国服务业产值占 GDP 的比重在所有样本国家中是最高的，这两个国家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长期维持在 70% 以上，特别是美国，在样本期内长期处于 75% 以上，而其他样本国家在绝大多数年份都在 70% 以下。在强服务业的发展模式下，金融、保险、房地产与租赁业务以及专业与商业服务等服务业高度发达，而制造业除了研发等保留在国内以外，加工、组装等价值链低端环节都通过全球价值链分工转移到其他国家。因此，美国与英国这种发展模式是在经济高度开放，同时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与生产网络的一种发展模式，经济存在“脱实向虚”的发展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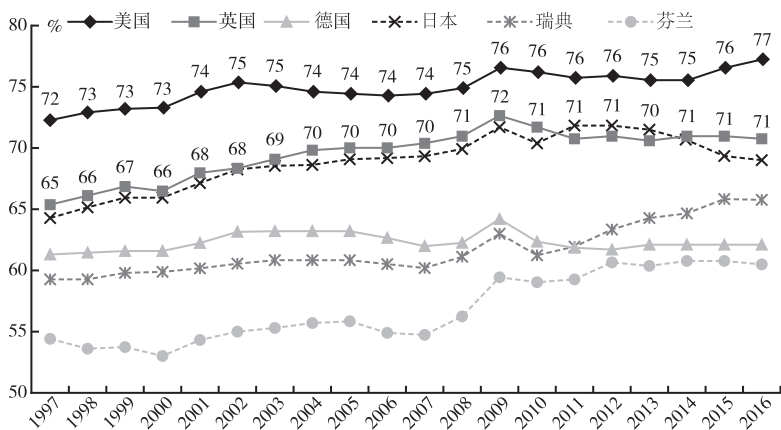


图 2 不同发达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数据库。

2. 强制造业发展模式。强制造业发展模式指的是尽管服务业占 GDP 比重超过 50%，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制造业仍然相对稳定地保持在较高水平，该模式以德国和日本最为典型。从图 3 报告的 1997—2016 年不同发达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来看，在样本期内，德国和日本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一直相对稳定地保持在 20% 左右，而美国、英国、瑞典与芬兰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则一直呈现出下降趋势。其中，制造业占 GDP 比重最低的是英国，已经长期在 10% 以下，而美国则长期在 15% 以下。因此，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强制造业模式在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后，仍然相

对稳定地保持了较高份额的制造业,但此时的制造业与工业化阶段的制造业已经存在较大区别,主要以技术、知识密集和高附加值的高端制造业为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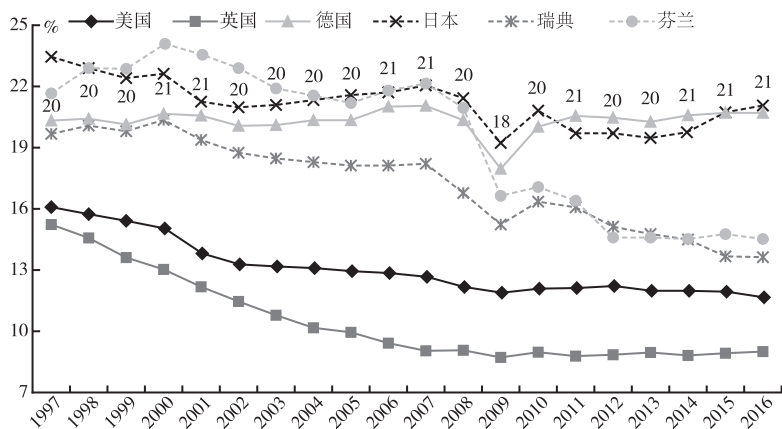


图3 不同发达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数据库。

3. 强创新发展模式。不同于强服务业与强制造业发展模式,还有部分发达国家在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后,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没有过高,同时制造业比重也没有过低,但是这些国家的突出特征是高度重视创新,主要以北欧的瑞典、芬兰等国家为代表。从图4报告的1997—2016年不同发达国家研发经费支出强度来看,瑞典与芬兰的研发经费支出强度多年来显著高于其他国家,长期维持在3%以上,这也使得瑞典与芬兰的创新能力强长期处于全球前列。因此,高度重视创新是该类型国家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主要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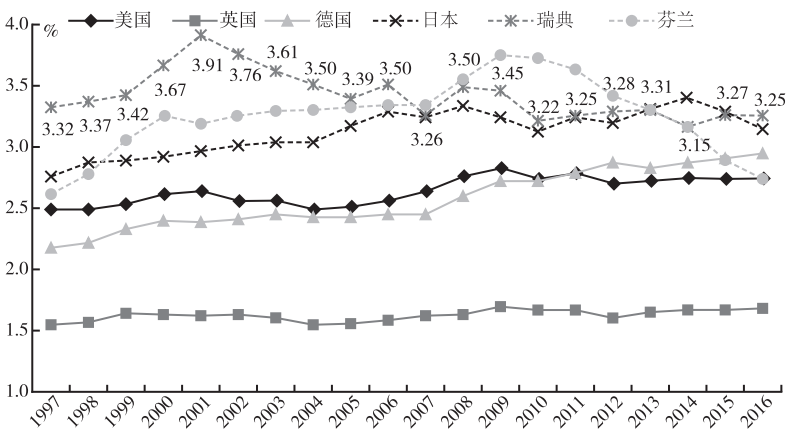


图4 不同发达国家研发经费支出强度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数据库。

三、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内涵

后工业化初级阶段是与工业化、后工业化阶段存在显著区别的一个独立发展阶段,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经济系统处于特殊均衡状态、最优发展模式存在特殊约束条件以及面临着陷入“后工业化陷阱”的特殊风险。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表明中国经济正经历发展阶段的转换,而后工业化初级阶段是进入“新常态”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期。

(一)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定义与特殊性

在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过程中,要素禀赋、经济结构与增长动力的转换都需要一定时间,本文将

由工业化阶段向后工业化阶段的转换期定义为后工业化初级阶段。因此,后工业化初级阶段与工业化以及后工业化阶段存在紧密联系,通常意义上的工业化阶段与后工业化阶段只是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发展初始条件与长期稳定均衡状态。

同时,后工业化初级阶段与其他经济发展阶段特别是后工业化阶段也存在显著区别,其中,除了后工业化初级阶段仅具备部分后工业化阶段的核心特征这一重要区别之外,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1. 在后工业化初级阶段,经济系统处于不稳定的特殊多重均衡状态。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期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的过程。此时经济系统中的均衡状态只是短暂和瞬间变化的,而且往往存在多重均衡;而在工业化与后工业化阶段,经济发展的要素禀赋、经济结构与增长动力都处于相对稳定的长期均衡状态。因此,从经济系统内部的稳定性来看,后工业化初级阶段与其他发展阶段是存在明显区别的。

2. 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最优发展模式存在特殊约束条件。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多重均衡特性意味着缺乏合理约束的发展模式可能会导致经济进入稳定的不合意长期均衡状态。因此,为了实现经济发展阶段的成功转换,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最优发展模式与工业化、后工业化阶段存在显著区别,直接套用后工业化阶段的发展模式可能存在巨大风险。例如,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后工业化初级阶段不能简单效仿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发达国家的模式,直接退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这是因为在后工业化初级阶段经济系统动态多重均衡的情况下,通过政府政策干预使经济向好的稳定均衡移动也是必要的(Kline, 2010)。同时,直接将后工业化阶段三个核心特征作为后工业化初级阶段经济的发展目标也可能导致转型失败。因此,为了保持经济处于最优发展路径上,必须对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发展模式施加特殊约束条件。

3. 后工业化初级阶段存在转型失败陷入“后工业化陷阱”的特殊风险。根据郝寿义(2016)提出的区域经济循环规律,当由工业化阶段主导的上一轮初级循环已进入衰退阶段,而新一轮后工业化阶段主导的高级循环才刚刚开始,新要素、新结构与新动力的形成出现滞后时,区域经济的发展正处于最低谷,表现为经济发展出现明显的衰退。如果衰退期持续的时间过长,此时由工业化向后工业化的转换便是不成功的。因此,忽视了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特殊性,经济发展阶段转换失败的风险将会增加,本文将这种风险称为“后工业化陷阱”,这是后工业化初级阶段与其他发展阶段相比面临的特殊风险。

(二)“后工业化陷阱”的具体内容

1. 增长动力不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目前成功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经济体都属于高收入经济体,在后工业化初级阶段,如果区域经济高级循环滞后于初级循环,特别是经济增长动力未能很好衔接,增长动力不足就会导致经济陷入停滞甚至回落状态,从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其中,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主要表现为在消费未能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前,过早地“去投资化”。以拉丁美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为例,1960—2011年其平均投资率分别为21%、20%和22%,而日本在起飞阶段的投资率为30%(代法涛, 2014),这种较低的投资率难以支撑其以较高的国民收入进入后工业化阶段。

2. 经济结构失衡导致产业空心化的风险。尽管第三产业占据主导地位是后工业化阶段的核心特征,但从成功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发达国家来看,其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虽然长期在降低,但工业产值的规模是在不断扩大的,且工业生产率在不断提高。例如,1987—2011年美国工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虽然由26%下降到19%,但工业总产值仍增长了约2.35倍,英国、日本、德国等也存在类似趋势(蔡鲁明、陈妍, 2013)。因此,后工业化阶段并不意味着产业空心化。反面典型的例子有巴西,2017年巴西第三产业比重已达到72.8%,比已成功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日本(68.78%)与德国(68%)都高,从产业结构来看已经具备后工业化阶段的特征;但巴西在后工业化初级阶段过早去工业化导致其产业空心化,经济结构失衡最终导致转型失败。

3. 创新驱动发展不足导致价值链低端锁定的风险。基于传统比较优势的分工为工业化阶段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但是,长期生产与出口附加值较低的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会使得发展中国家难以积累足够资本进行高强度研发,创新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变大;同时,由于价值链高端环节市场集中度越大,发展中国家企业向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面临的风险也更大(Bair & Gereffi, 2001)。因此,由于自身创新能力与水平尚不够强,后工业化初级阶段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面临着被发达国家低端锁定的风险。中国以及东南亚的菲律宾等目前都面临着价值链低端锁定的风险。

(三)后工业化初级阶段与中国经济“新常态”

习近平在 2014 年提出了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战略判断,“新常态”揭示的中国经济所呈现出的新特征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正在发生转换。

首先,进入“新常态”后,中国经济发展已完成工业化阶段。2018 年《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已明确指出“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同时,进入“新常态”后,中国经济发展呈现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三大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可以发现,上述三大特征与本文揭示的后工业化阶段核心特征密切相关,这表明当前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由工业化阶段向后工业化阶段的转型过程,已经进入了一个不同于工业化阶段的新阶段。

其次,后工业化初级阶段是进入“新常态”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期。按照传统观点,工业化阶段之后应该为后工业化阶段。但根据本文理论分析,在工业化向后工业化阶段的转换期还存在一个特殊的后工业化初级阶段。在新时代已完成工业化阶段后,中国经济会首先进入后工业化初级阶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成后工业化初级阶段、实现经济发展由工业化向后工业化阶段的成功转换后,才会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因此,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发展状况决定着中国经济能否成功实现由工业化向后工业化阶段的转型,因而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的关键期,这一阶段的持续时间取决于中国经济转型的速度。

四、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事实判断

本部分首先提出了大国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判断标准;其次,基于中国宏观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从要素禀赋、经济结构与增长动力转换三方面,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进行初步判断,研究发现中国目前正处于后工业化初级阶段。

(一)大国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判断标准

由于工业化初级阶段是由工业化向后工业化阶段的转换期,因此,对后工业化初级阶段最直接的判断标准是一个经济体如果仅具备部分(至少符合一项)后工业化阶段的核心特征,那么该经济体就处于后工业化初级阶段。根据上文对后工业化阶段核心特征与典型发展模式的总结,本文提出以下三个定量的后工业化核心特征判断标准:(1)研发经费支出强度高于 2%;(2)第三产业产值比重最高,且超过 50%;(3)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超过 50%,且绝对值最大。

由于经济发展阶段转换过程中经济空间结构的调整仍需要一定周期,因此上述一般标准在判断大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时会存在较大偏差。特别是对中国这一内部非均质性非常强的大国而言,区域间经济发展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本文进一步提出大国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判断标准,具体分为两种情况:(1)宏观与区域层面都仅符合部分(至少一项)后工业化阶段的三个核心特征;(2)宏观上已经全部符合后工业化阶段的三个核心特征,但大部分区域仍然仅符合部分(至少一项)后工业化阶段的三个核心特征。上述两种情况都表明该大型经济体正在经历由工业化向后工业化阶段的转换期,因而处在后工业化初级阶段。

(二)中国宏观经济层面的事实判断

1. 中国研发经费支出强度变化趋势。为了衡量技术或者创新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本文用研发(R&D)经费占GDP的比重来衡量研发经费支出强度,以此来反映技术与创新要素作用的变化。图5报告了1995—2018年中国研发经费支出强度的变化趋势。中国研发经费支出强度总体上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从1995年的0.6%上升为2018年的2.18%,23年间提高了2.6倍,特别是2008年之后,中国研发经费支出强度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从目前已经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发达国家来看,其研发经费平均支出强度常年维持在2%左右。中国在大部分时间内都低于这一水平,但从2013年之后,中国开始达到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这意味着技术与创新要素在中国宏观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此外,从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来看,从2012年开始,中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已经超过欧盟、日本等,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位,且在此之后与美国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这也佐证了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水平的提高。因此,从要素禀赋转换的角度来看,可认为当前中国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具备了一定后工业化阶段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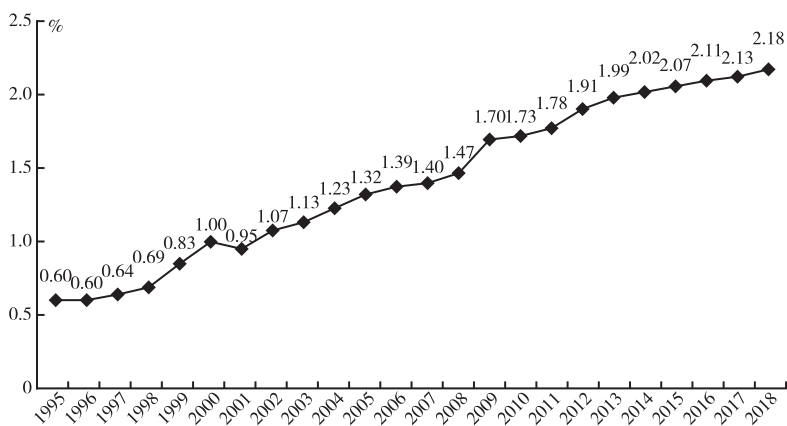


图5 中国研发经费占GDP比重

数据来源:1995—2017年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2018年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 中国三次产业结构变化趋势。为了衡量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情况,图6报告了1978—2018年三次产业产值占GDP比重的变化情况。可以发现,中国第一产业比重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由1978年的27.7%下降为2018年的7.2%;第二产业比重则在40%~50%的区间内波动;第三产业的比重则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由1978年的24.6%上升为2018年的52.2%。从三次产业结构来看,1978年中国的产业结构为“二一三”类型,而到2018年则成为“三二一”类型,中国宏观经济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

具体来看,中国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存在几个重要的节点:一是在2013年,三次产业比重为9.3:44.0:46.7,第三产业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占比最高的产业;二是在2015年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50%,这意味着第三产业开始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与本文提出的后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上的特征一致。因此,最晚从2015年开始,中国在产业结构上已经开始具备了后工业化阶段的核心特征。

3. 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度。为了反映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图7分别报告了1978—2018年投资、消费与净出口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总体而言,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都存在较强的波动性特征,但投资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要明显大于净出口。从投资与消费贡献度的相对大小来看,2011年之前大多数年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要高于消费,但在2011年之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在绝大多数年份开始超过投资;特别是从2014年开始,消费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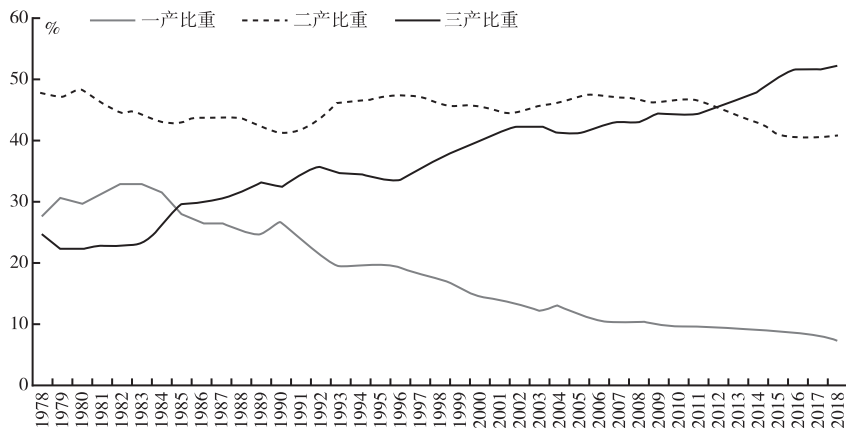


图6 中国三次产业产值占GDP比重

数据来源:1978—2017年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2018年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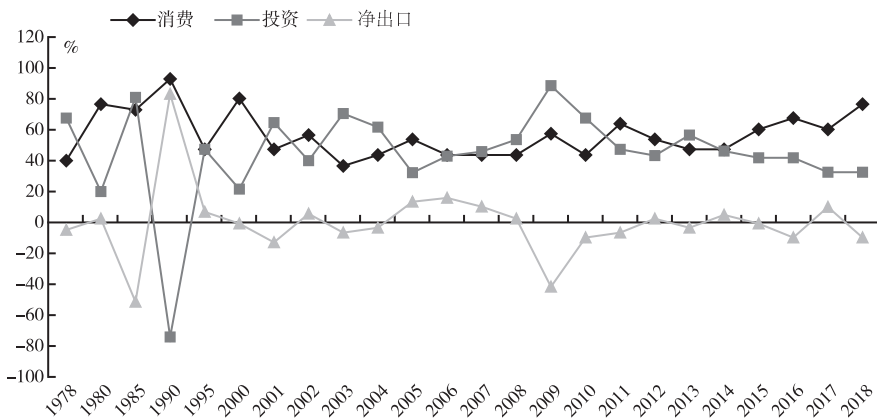


图7 中国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度

数据来源:1978—2017年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2018年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度超过投资,两者出现明显的背离,并呈不断扩大趋势,这表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断增强。其中,在2015年消费的贡献度为59.7%,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并在之后不断强化。因此,从经济增长动力来看,中国在2015年左右开始进入了消费主导的发展阶段。

(三)中国区域经济层面的事实判断

上文针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分析表明,大致在2015年后中国宏观经济开始同时具备了后工业化阶段的三个核心特征。本文进一步对中国不同省份的经济发展阶段进行判断,表1报告了中国大陆31个省级行政区后工业化阶段标识性指标发展情况。

表1的结果表明,2017年中国大陆31个省级行政区中,同时符合后工业化阶段三个核心特征的只有北京、天津、上海和浙江四个地区,其中北京和上海的后工业化阶段核心特征最为明显,而其他27个省份只部分满足后工业化阶段的核心特征。

从分项指标来看,满足后工业化阶段研发经费支出强度标准的省份有8个,而满足产业结构标准的省份有12个,满足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度标准的省份有17个,因此,研发经费支出强度不足是制约不同省份由工业化阶段向后工业化阶段转换的主要短板,这是因为在区域经济发展阶段转换过程中,由区域经济发展高级循环所主导的要素禀赋变化是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根本动力,所以要素禀赋变化的难度是最大的。

总体而言,中国宏观经济整体上具备了后工业化阶段的三个核心特征,但从不同区域来看,仅有北京、天津、上海和浙江四个省、直辖市全部符合后工业化阶段的三个核心特征,其他大部分省份仅有部分指标符合后工业化阶段的核心特征。中国当前进入的后工业化阶段具有显著结构化特点,与发达国家已经全面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情况是存在显著差异的。根据本文提出的大国后工业化初级阶段判断标准,这表明中国尚处于工业化阶段向后工业化阶段的转换期,因此,目前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应为后工业化初级阶段。

表1 不同省份后工业化阶段标识性指标(%)

	研发经费支出强度	一产比重	二产比重	三产比重	消费贡献度	投资贡献度	净出口贡献度
北京	5.96	0.43	19.01	80.56	61.20	37.18	1.62
天津	3.00	0.91	40.94	58.15	62.09	-17.62	55.53
河北	1.20	9.20	46.58	44.21	78.09	22.95	-1.05
山西	1.03	4.63	43.65	51.71	52.77	-93.40	140.63
内蒙古	0.79	10.25	39.76	49.99	-21.28	114.15	7.13
辽宁	1.69	8.13	39.30	52.57	54.01	38.32	7.67
吉林	0.94	7.33	46.83	45.84	138.82	-102.99	64.17
黑龙江	0.99	18.65	25.53	55.82	105.02	72.53	-77.56
上海	3.82	0.36	30.46	69.18	55.98	35.53	8.49
江苏	2.66	4.71	45.02	50.27	41.51	49.87	8.61
浙江	2.43	3.74	42.95	53.32	60.38	30.34	9.28
安徽	1.97	9.56	47.52	42.92	53.10	46.57	0.33
福建	1.59	6.88	47.71	45.41	45.57	55.63	-1.20
江西	1.13	9.17	48.12	42.70	57.09	47.87	-4.96
山东	2.34	6.65	45.35	47.99	65.87	38.51	-4.38
河南	1.23	9.29	47.37	43.34	57.65	36.45	5.90
湖北	1.86	9.95	43.52	46.53	68.15	73.50	-41.65
湖南	1.50	8.84	41.72	49.43	83.08	36.07	-19.15
广东	2.56	4.03	42.37	53.60	47.94	56.61	-4.56
广西	0.65	15.54	40.22	44.24	326.33	-1458.71	1232.38
海南	0.54	21.58	22.33	56.10	71.40	58.27	-29.67
重庆	1.72	6.57	44.19	49.24	50.24	49.23	0.53
四川	1.72	11.53	38.75	49.73	52.59	45.87	1.53
贵州	0.63	15.01	40.09	44.90	43.11	65.84	-8.94
云南	0.89	14.28	37.89	47.83	57.52	99.73	-57.25
西藏	0.19	9.36	39.18	51.46	90.38	133.75	-124.13
陕西	2.19	7.95	49.70	42.35	35.38	60.30	4.31
甘肃	1.22	11.53	34.34	54.13	152.95	-412.50	359.55
青海	0.54	9.08	44.29	46.63	265.53	633.45	-798.99
宁夏	0.95	7.28	45.90	46.82	80.58	-7.63	27.05
新疆	0.59	14.26	39.80	45.94	90.63	177.07	-167.70

注:研发经费支出强度用2016年数据代替,数据来源于2017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其他指标都为2017年数据,数据来源于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

五、新时代中国的经济转型

由于中国已进入后工业化初级阶段,因此新时代中国经济转型必须基于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发展模式。为了实现由工业化阶段向后工业化阶段成功转换,中国后工业化初级阶段发展模式的最根本导向是要立足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但是,本文研究表明,直接将后工业化阶段发展模式套用

于后工业化初级阶段是不合理的,为了规避“后工业化陷阱”风险,中国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发展模式需要满足以下约束条件:

(一)通过保持合理的投资水平来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

在短期特别是经济处于下行周期时,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要更为显著。投资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相对于消费与净出口的政策灵活性要更强,因此政府通过调整投资来干预经济、使经济趋向于合意的长期均衡是非常必要的。从经济增速来看,中国2018年GDP增长6.6%,为199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前中国正处于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转型的关键时期,因此仍然必须保持合理的投资水平来维持经济增速处于合理区间范围内,避免进入“中等收入陷阱”。以日本这一成功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国家为例,1960—2011年其年均投资率为28%,略低于同期中国的34%,仍维持了较高的投资水平。同时,合理投资水平的确定必须考虑中国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结构特征:一方面,对于仍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区域而言,加强投资仍然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合理要求;另一方面,对于已经具备明显后工业化阶段核心特征的区域,在鼓励扩大内需、提高消费率的同时,仍应保持投资的合理增速,实现不同经济增长动力的顺利衔接。

(二)通过保持合理规模的制造业来促进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深度融合

后工业化初级阶段仍需保持合理规模制造业的原因在于:一是中国经过工业化阶段的发展,制造业基础雄厚,这是中国在当前国际竞争中的重要优势。在当前国际格局下,直接套用美国的强服务业发展模式既不可取,也不符合当前中国已经拥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这一实际情况。中国目前已经建立起门类齐全、配套完善的制造业体系,2010年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约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四分之一,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头号制造业大国,已成为新的“世界工厂”,这是中国构建后工业化初级阶段发展模式必须要考虑的现实约束。从新加坡的转型经验来看,1990—2015年期间,其人均GDP由1万美元上升为3万美元,而制造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均保持在23%左右(郑睿,2017)。因此,在后工业化初级阶段制造业的发展要避免“去工业化”。二是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发展需要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主要体现为制造业向服务业渗透,生产性服务业规模扩大,出现制造业服务化的趋势;同时,定制设计、柔性制造等新型生产方式不断出现,服务要素在制造业投入和产出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制造业从以加工组装为主向“制造+服务”转型,从单纯出售产品向出售“产品+服务”转变。因此,后工业化初级阶段不是不要制造业,而是要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保持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协调发展。

(三)通过供给侧改革来应对消费升级的趋势

在后工业化初级阶段,中等收入群体正处于迅速增长的时期。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中国的中产阶级群体也在不断壮大,2017年中等收入群体超过3亿人,约占全球中等收入群体的30%以上。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带来的旺盛市场需求为中国经济增长实现由投资拉动向消费拉动提供了客观条件,更重要的是带来了消费规模与结构的升级,此时的重要矛盾是供给与需求结构不匹配的问题。基于工业化阶段的供给已不能满足后工业化初级阶段中产阶级对消费质量、消费体验与消费结构的需求。因此,为了应对消费升级的趋势,中国应该通过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优化供给结构和提高供给质量,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充分利用国内大市场;同时,中国应积极鼓励进口,成为全球大市场,并在此基础上获得全球市场的支配权与话语权。

(四)利用新一轮技术革命契机来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在技术水平上与先行的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距,如果缺乏自主创新能力,仅靠对发达国家的模仿式创新很可能难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而形成与发达国家的持续性差距(Grossman & Helpman, 1991),导致中国在后工业化初级阶段陷入价值链低端锁定的状态。从外部环境来看,第四次技术革命为中国后工业化初级阶段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机遇。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第四次技术革命的核心领域上,中国与发达国家处于同一起跑线,在某些领域已经具备一定领先优势;同时,第四次技术革命正在深刻地改变产业组织形态,新产业、新业态与新模式不

断出现,这为中国后工业化初级阶段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更多机遇。因此,中国应抓住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机遇,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完善国家创新体系,高度重视提高创新能力,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

参考文献:

- 代法涛,2014:《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理论、经验和对策——基于44个国家的跨国实证分析》,《财经研究》第2期。
- 郭克莎,2004:《中国工业发展战略及政策的选择》,《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 郝寿义,2016:《区域经济学原理》,格致出版社。
- 胡鞍钢,2017:《中国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 胡立君等,2013:《后工业化阶段的产业空心化机理及治理——以日本和美国为例》,《中国工业经济》第8期。
- 纪明 梁东黎,2011:《后工业化时代经济大国低经济增长率之迷:结构变迁视角》,《经济管理》第3期。
- 綦鲁明 陈妍,2013:《大国工业化完成的重要标志及后工业化时期的主要特征》,《经济研究参考》第68期。
- 卫兴华 侯为民,2007:《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与转换途径》,《经济研究》第7期。
- 文宗瑜,2010:《我国后工业化时代的产业升级与企业转型之路》,《中国财政》第13期。
- 吴垠,2010:《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检视与思考——后工业化经济试验区的前瞻性探索》,《中国工业经济》第10期。
- 夏杰长 倪红福,2016:《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服务业还是工业?》,《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第3期。
- 徐朝阳,2010:《工业化与后工业化:“倒U型”产业结构变迁》,《世界经济》第12期。
- 郑睿,2017:《后工业化时代上海制造业发展定位和对策研究》,《当代经济管理》第9期。
- Bair, J. & G. Gereffi (2001), “Local clusters in global chains: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export dynamism in Torreon’s blue jeans industry”, *World Development* 29(11):1885—1903.
- Bell, D. (1973),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New York: Basic Books Press.
- Chenery, H. B. et al (1986), *Industrialization and Grow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alor, O. & D. N. Weil (2000), “Population, technology, and growth: From Malthusian stagnation to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beyon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0(4):806—828.
- Grossman, G. M. & E. Helpman (1991), *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the Global Economy*, MIT Press.
- Kline, P. (2010), “Place based policies, heterogeneity, and agglomer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0(2):383—387.
- Kuznets, S. (1955),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5(1):1—28.
- Porter, M. E. (2000), “Location, competi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ocal clusters in a global economy”,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 14(1):15—34.
- Rostow, W. W. (1960), *The Stages of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e Primary Stage of Post-Industrialization and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the New Era

HAO Shouyi¹ CAO Qingfeng²

(1.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China; 2. Tianj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ianjin, China)

Abstract: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 has been the underlying reason for the slowdown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in recent years.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circulation law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from the industrialization to the post-industrialization stage is an independent primary stage of post-industrialization development. Empirical facts on macro-economy and regional economy show that China has entered the primary stage of post-industrialization, on which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should be based. In the course of building a modern economic system, the mode of development in the primary stage of post-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should be imposed constraints, including maintaining a reasonable growth rate of investment and the scale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strengthening the supply-side reform and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Keywords: Post-Industrialization; Development Stage; New Era;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责任编辑:谭易)

(校对:孙志超)